

## 柳步青<sup>①</sup>

地点：北京口腔医院宿舍

时间：1994年11月3日



柳步青

钟：很高兴能够见到您，想请您谈一谈您在30年代到日本留学的种种情况。您是怎样去了日本的？

柳：我们那个时代呀，今天实在是说不清楚了。我是泰国华侨，从小在曼谷。祖上都是从广东去泰国谋生的，老家在广东大埔山区，那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地方，开门见山的。所以有点办法的就往外走。我是在11岁才回到大埔的。念完小学和大埔中学，我就到广州市。当时正好是北伐战争的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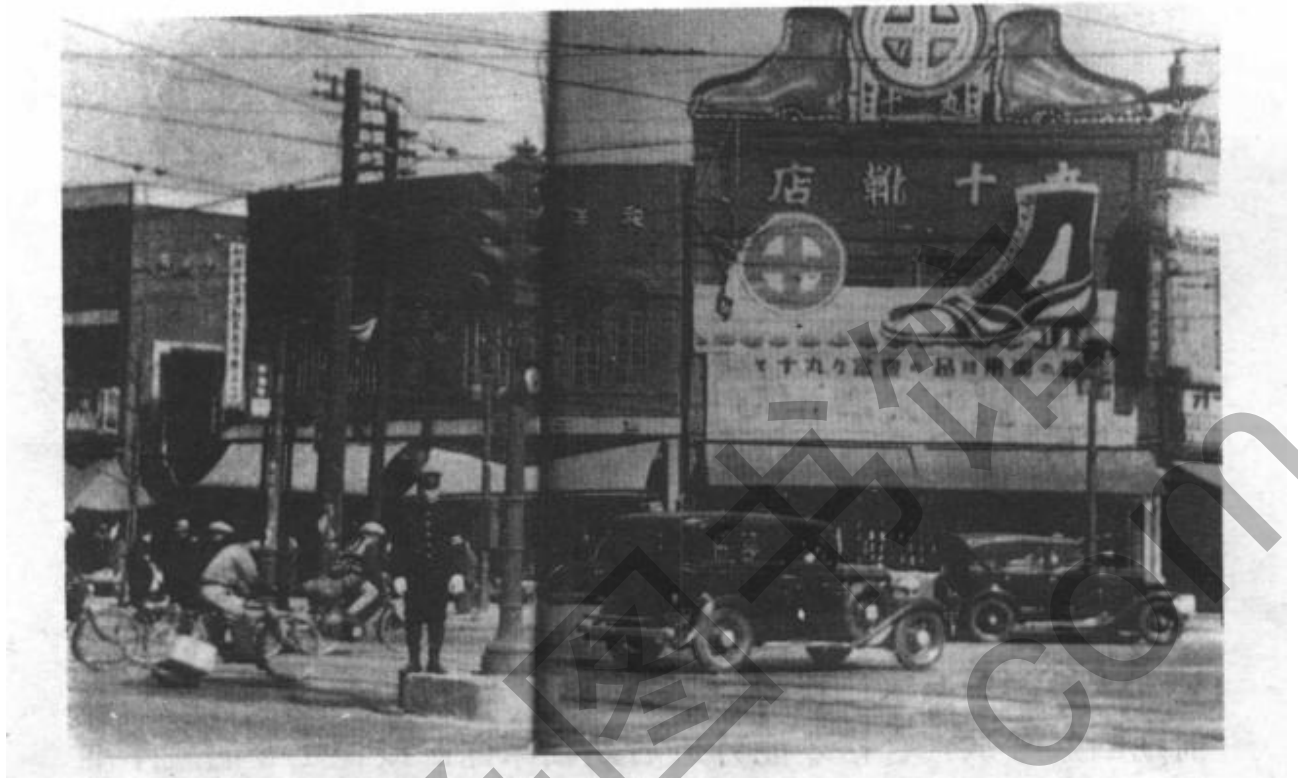
---

<sup>①</sup>柳步青，泰国华侨。1927年在中山大学学习。1931年赴日本留学。1946年回国。东京大学医学部选科、千叶医科大学本科毕业。现为北京口腔医院名誉院长。

二年，我到中山大学念书，还听过鲁迅先生的课。由于我在中学时，有位老师是秘密的共产党员，当时叫做C·P，他发展我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叫CY。我到中大，跟CY联系上了，也参加工作。国民党开始清党，捉到共产党员不审就杀头。中大CY的秘书也是我们乡下人，有一天他家不小心给暴露了，搜出CY的名单。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就到中大抓人，名单上我填的名字是柳尽晓，他们查了半天也没有此人，也就暂时放弃了。别的同学来告诉我说：“警备司令部要抓你，你想办法走吧。”我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香港，后来又去了泰国。十几岁的人，没有工作，我住在我一个做医生的表哥家里，帮他做点事情。我还是想念书，怎么办呢？当时泰国华侨人很多，中华总商会就替代领事一方做事，如慈善事业有善堂、医院什么的。也有一种贷学金，跟奖学金有所不同，你毕业之后要分期还钱的。我找了保人，报名考试合格，就给我钱了。后来等我在日本的大学毕业，由于通货膨胀，贷方已经无意索回。

我在1931年12月，从曼谷回到汕头，到市政府领取外交部的护照，然后到日本驻汕头的领事馆，门房收了我给他的3块钱，带我到领事面前。领事问我几句话，就在护照上盖“入国签证”章和签名。我拿到香港就上船了。船是加拿大的邮船，很大，约有万吨吧，两周一次航班。我乘的经济仓是15元一张票。我在泰国时学了点日语，但一用就不行了。幸好在船上认识一位早年在东京工大的学生杨君，由他照应。我们在神户上岸，乘车去东京。我仅在香港买了件毛衣穿，下身还是单裤，冻得我手脚发僵。

住下之后，老同学就领我到神保町的东亚日语预备学校报名上学，记得是在“水道桥”车站下车。开始我住在杉并区。我心里很着急，想早点上大学，一早起床，看同学还在睡觉，我



东京神保町路口（1934年）

就勇敢地出门上学去。坐上“省电”，越看越不对，一下子就到了“东京”站。我决定往回走，不巧又上了快车，刹时间又回到原地方。无奈，我只好下车，用英语问车站工作人员。他用日语回答，我不懂。一急之下，我用泰国语问他，他们更是不懂。等我拿出车票给他们看，他们才了解我的意思，指示我过天桥去乘另一列慢车。那天我起了个大早，但到学校已是最迟的一个了。还有个同学更有趣，有一次他想买鸡蛋，别人教他：鸡蛋的发音是“Tamago”，相当于中国话“他骂我”，记住“他骂我”就好了。他到商店里买鸡蛋时，把顺序给颠倒了，对人家说：“我骂你”。售货员听不懂，他又改说：“你骂他”。人家还是不懂。最后他才想起说：“他骂我，他骂我”。售货员笑起来，给了他鸡蛋。

钟：您在学校上学的情形如何？

柳：当时在东京有一个“中国留学生监督处”，是教育部的派出机构。中国学生要想考日本的大学或专科学校，必须有监督处的正式介绍信，规定每人只介绍3个学校。如果这3个学校都考不上，就只好再等下一年。我初去时，本想进医科大学的，因为没有被录取，所以才进东京齿科医学专门学校。东京齿科是老牌学校，每年级分甲乙两班，每班100人，4年毕业，学费也比较高。我一直没有申请官费，全靠那点贷学金，后来也参加点工作。我在东京住的“贷间”，生活很方便，同房东老太太关系很好。后来我进千叶医科大学时，她还经常到千叶来看我。我自己在外面吃饭，定食一份是1.5角钱，吃了好多年。

医科学习要求比较严格，不准缺课。前期基础课学完，有前期国家考试，合格才能升进后期临床课。缺课1/5的就不准参加考试了。所以学习都很紧张，每星期都排得满满的，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。

1936年12月的“西安事变”消息，传到了日本，在中国留学生里也引起一些波动。有人主张应该将蒋介石赶紧干掉；也有人如丧考妣。当时驻日大使是许世英，这位先生在老官僚里算一个庸碌之辈，日报形容他如同女性。事发时有日本记者问他：“蒋介石被抓后，蒋政权前途如何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们国家只有国民信赖的政府，没有什么蒋政权。”

1937年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前，日本学校正放暑假，一般从7月到9月上旬，大多数人都离校去避暑。我去了伊豆半岛海滨，那里有专门租给学生的房间，自己做饭吃。每天早上看书，午饭后睡一会儿，2点下海洗浴，晚饭后散步或参加活动等。街内还有温泉風呂（浴池），不但水温高，而且泉量大，还有温泉游泳池。温泉浴池是男女混在一个浴池里洗浴的，起初我不大相信，等进去一看果然如此，而且大部分是女的。我想

不对要退出来，但再看还是有男的，所以我也就安心地洗下去了。日本人洗澡的方法和我们不同，他们先用水净身擦背，最后才进池子里面去泡一泡，所以他们池子里的水很干净。同时他们有相互擦洗身体的习惯。我在乡下同学家里做客时，在他家里洗澡，他妹妹就问过我：“要不要替你擦身？”他们从小就有这种习惯，男女在一起也就不会和我们一样的大惊小怪了。

芦沟桥枪声一响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十分嚣张，报纸上每天都是“支那军阀残暴杀害帝国臣民”、“暴支膺惩”等标语。我赶回东京，留学生们大多回国去。我们几个泰国留学生商量，留下来再看看。因为我还有一年就毕业，舍不得半途而废，就留下来了。一直到1946年8月回国止，我在日本学习毕业，过着和日本学生完全一样的生活。

我在东京齿科毕业后，一面工作，一面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选科。因为我看到，日本的医师和牙科医师分得很清楚。医师可以干牙科，而牙科医师则绝对不能够侵犯医科业务。牙科医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，日本叫做“医齿者”，就跟中国的“镶牙匠”差不多。有一次我去拜访东大齿口科金森教授，在他的住宅附近找不到，就问邻近居民。我刚说出金森教授的名字，他就若有所思地轻率回答道：“啊，是那医齿者吗？”这句话真是刺痛了我的心。当时我想，金森教授是东大医科毕业的，也是医师，算起来，在世界上也是有数的名家，就是因为主持齿口科工作，便被打下十八层地狱，列入“医齿者”行列。这也就是我决定再进医科大学的动机。到后来，我又考进千叶医科大学本科，一直念到毕业为止。

钟：您对社会生活有什么回忆？

柳：1943年起空袭频度加紧后，日常生活深受影响。千叶大空袭时，学校教室全部被毁，医院也损失严重。我的手脚都

受过弹片伤。这时所有的同学都被征召入伍当军医去了，我只好写信给一位同学的父亲，问他能否让我暂时到他乡下去避一避，可以帮帮农忙，条件是只要给我口饭吃。他父亲回信说，可以赶快去，不但管饭，还有相当的薪水。原因是他们村里迁来许多工厂，眼下正缺一个医师。我就去生活了一年时光，也算是我体验日本民间生活最有意义的时光。地点在长野县户仓町，我在这里不但上班，还学会骑马和滑雪，而且还有一段没有演完的“罗曼斯”。原因在我同学的大妹妹，她当时是专科毕业后闺中待字。我住她们家，不用说她父母很客气，尤其是她对我照料得无微不至，这真叫我有些为难。衣服脱下来抢着就拿去洗，连我喜欢吃什么、爱好什么，她也调查得很仔细。逢到我回千叶，她每天都有信来，写得很有感情。不过我在东京时已经有了女朋友，她是东京出生的华侨，家在上海，因为空袭得太厉害，已先我回国。而且，我母亲曾一再叮嘱，千万不能在日 本结婚。因为我舅舅也是留日学生，他带回一位日本籍的舅妈，结果弄得很不好。

还有一件事，是我在大学毕业后，到内科教室当助教时期。同期也有一位从女子医专来的，大家工作特别忙，但她总是对我照顾特别好。她是独生女，为了继承产业，就得招女婿入籍。我是个中国人，根本没有这种可能。但有一次她误会了。中午饭后，我们在屋顶上散步，无意间谈起这种招女婿的风俗，我说：“原来是请进来吗？（ソウカ来ッテ贯つノカ？）”她误以为我是向她求婚，立即一本正经的回答说：“我那里配呢！（トンテモナイ，先生，私ノ样ナモノ！）”其中是含有可以商量的意思的，我可无话可说了。幸好我很快就回国了，迨来 30 多年，这两位后来都和医师结了婚，生活都很幸福。1978 年，我去日本旅行时都碰上了，互相间还回忆了这段往事，重温了这种不

可思议的“缘分”，或者说是“命运”吧。

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也很深重，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了，再讲一个小故事吧。有一次，我同学的兄弟被征召入伍，营地就离千叶市不远，他家来信要我去看他，同时捎点吃的东西去。我拣了个星期天，带了包年糕去看他。营房会客地方有宪兵巡查，不让带食品给军人。见面时他说每天吃不饱，夜里很饿。我告诉他带年糕来了。他非常高兴，瞒着我离开一会儿，等宪兵走后他才回来。我问他去哪儿了？他说上厕所把年糕都吃了。我觉得实在可怜，国内士兵都饿得这样，你这个仗怎么还能打呢！